·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篇与七体

常 昭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 要]北京大学藏汉简中的《反淫》一篇从形式上看属于赋体文献。《反淫》的面世在辞赋史上意义重大。由"五"到"七"数理的变化透露出早期赋体文学发展的脉络。"七体"的论述方式,适应了汉代大赋追求叙事全面、气魄宏大的审美要求。《反淫》所设主客二者为虚无飘渺的形象,其问答实为人的两面性进行心理斗争的过程,借以展示人内心的丰富复杂以及自我理性成长的自豪感。《反淫》为"七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关键词]北大汉简;辞赋;《反淫》;七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5-0046-06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给当前古代文学研究者以许多启示。2009年初,北京大学获赠一批竹简,经鉴定发现竹简大约抄写于西汉中期。这批竹简中的一批文学类古佚书尤其引人注目,令我们对汉代文学的认识加深了一步。其中的《反淫》一篇揭示了早期辞赋发展史上的一些规律,弥补了西汉辞赋发展轨迹的断点。《反淫》从形式上看属于赋体文献,因其结构成篇的方式与西汉枚乘所作《七发》接近,被文学史研究者认定为"七体"作品。目前,《反淫》的简文图版只公布了少数内容,见《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①。本文仅就已知公布部分加以讨论,力求揭示本篇作品在汉代辞赋史上的特殊地位。

一、《反淫》的"七"体价值

我们所熟知的"七体"是由枚乘开创的一种赋体,具有较为鲜明的结构形式和论述特色,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北京大学汉简的整理者将《反淫》归于七体。

(一)《反淫》具备铺陈的论述结构形式

整理者介绍《反淫》时说:"《反淫》,现存竹简59枚,1200余字。本文有篇题'反淫',文体属'七'体,以'魂'铺陈七事说'魄子'构成全文。与《七发》等七体文相比,其铺陈的文字简短,不如《七发》那样波澜壮阔。所列七事涉及射御、游观、宴饮游戏及孔老等要言妙道等内容,颇为丰富。自枚乘《七发》首倡以后,此文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者,为研究'七'体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还有人认为北大汉简的《反淫》中有许多文句具有与枚乘《七发》相同的"七体"特征②。

西汉枚乘的《七发》确立了七体独特的表现形式,全文主要由虚设的楚太子与吴客两者反复问答结构成篇,吴客通过敷陈七件事来诱导楚太子,分别是音乐、饮食、车马、游乐、校猎、欢宴、观涛等七种物欲享受,循序渐进引起楚太子的兴趣,最后以精神需求战胜物质享受令太子幡然醒悟从而病

[作者简介]常昭,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

②傅刚,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

愈结束全篇。

首先,“七体”是一种专事铺叙的文体形式。铺陈其事以说服他人,在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及叙事散文已初见端倪。诸子散文常举五事以说理,大概因为“五”可以概括某一事物所有的方面,如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①五色代指好看的事物,五音代指好听的声音,五味代指好吃的食物。这里不仅使用五色、五音、五味来概括人间欲望之丰,而且除了色、音、味,还加畋猎、难得之货两种情形,共列举了五种事物来论述圣人之治,最后一句话加以总结。在以雄辩为主要特征的《孟子》一书中,并举五事也很常见。《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为揭示梁惠王之大欲,列举五件事进行反问,“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②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孟子一语道破梁惠王的目的,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一总结得到了梁惠王的肯定并表示了信服。在这段五加一的文字中,对于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之五事虽没有进行详细的铺陈,但论述的角度却颇有启发性,即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要求出发,尽可能充分地列举享乐欲望的各种形式,积蓄所有可资反驳的力量准备下一步的论述,从而使得最后的真相即梁惠王之“大欲”得以揭示。但本段言论仍为语录体的文章形式,属于大段文章中的一个段落而非单列篇目,只能视为后来的七体的滥觞。“七体”的行文展开方式也是由物欲出发列举多种人生享乐的方式,最后超越于物质享受的其他追求,压倒一切以结束全文,而这最后一种描述往往属于一种精神理念,在先前所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升华,从而一举推翻上述生活方式或所述事理。不难看出这种体裁的文章是以铺叙为主要写作手法的。

其次,在“七体”的结构上存在一个并列或递进的关系。在先秦叙事散文中,也有许多文章以五加一的行文方式论述事理,有时通过重重超越和否定来表达讽喻意图,这在先秦俨然成为一种行文的惯例。除了上文所举《老子》《孟子》等例子之外,另如《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章,庄辛先是列举蜻蛉、黄雀、黄鹄三种事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处理困境所需的策略,由小及大,论说到蔡圣侯及至君王之事,举五事以讽喻楚襄王,最后,“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慄。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③展示了论辩艺术极强的说服效果。在本篇文章中列举五事的篇幅占了较大比重,对每一种事物的具体描述更为详尽生动,自觉渲染、肆意夸张的意味非常浓郁。《孟子》说梁惠王的片断陈说五事不仅简略,而且五事为平行关系,体现不出步步深入的论说层次,在“庄辛说楚襄王”一段中这五事则为递进关系,一层比一层更甚,逐步盘升,显示了创作者刻意追寻言论效果的用意。

先秦时期的论说文章由零散的论述到有组织的论述,再到列举五种事物,由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体现文学逐步发展的过程,对五种事物或五个角度的描述愈加详尽,更勾画出人们对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对语言技巧的揣摩用心。这为汉代文章论述事理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二)《反淫》揭示“七体”发展的线索

由“五”到“七”数理的变化透露出赋体文学发展的脉络。《文选》五臣注云:“七者,少阳之数,欲发阳明于君也。”清王兆芳《文体通释》:“七者,阳数之逾五者也。古恒言半曰五,小半曰三,大半曰七,设客主为七章也,主于托物问答,讽喻归道。”④说理假托二人问答,遍举诸事以展开全文,最后归于理性战胜感性,此七体所用之道。古人认为“五”仅为半数,不足以施展文气,再增添二事,

①李零:《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页。

②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

③(西汉)刘向编;贺伟,侯仰军点校:《战国策》,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75页。

④(清)王兆芳:《文体通释》,北京:中华印刷局,1925铅印本。

令为七事,则增强文章气势。另一方面,列举七事以议论,适应了汉代大赋追求叙事全面、气魄宏大的审美要求。

西汉出现七体的原因可以推测,首先是这种体式可以尽情发挥原来辞赋铺陈扬厉的写作文风,这原本是西汉文人驾轻就熟的技艺,又因七事罗列较易模拟从而受到后人的竞相仿作。再者,"七"还意味着七窍所享。《庄子·应帝王》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七窍的享受启发人们从七个不同的角度陈述人之本性欲望。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予有慕之焉。"①晋傅玄《七模》序也进一步列举了诸多七体作品及写作七体的作家,拟作数量较多,作家影响较大,因而七体作品渐成一种独立的大赋存在形式,世称"七体",《文选》列"七"一门,《隋书·经籍志》著录"七林"十卷,"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终得以确认。

《楚辞》有署名东方朔作的《七谏》一文,古人多以为"七体",今学者多进行过辨析,认为非七体之作。如熊良智认为:"从内容、结构、风格上说《七谏》决不是'七'体一类的文章。"②另如詹杭伦等明确提出《七谏》非"七"体的观点,"《七谏》只是有一个带'七'字的题目,并非问答之体,亦没有铺陈敷衍出七件事,而是以抒情、咏叹为主,与《九章》之体相同。因此,本篇绝非'七体'之代表。"③这些论述从反面证明了题目中带"七"字的文章并不一定符合后世"七体"的各项特征,"七体"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问答体、铺陈敷衍七事。当然,这时的"七"这个数字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创作实践上也有着灵活变动,容下文论述。

自枚乘独创七体后,后人一般以傅毅《七激》作为继踵之作,可称七体发展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除上述曹植的《七启》序及晋傅玄《七模》序中提到之外,其他一些文献记载了这一说法,如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④刘勰首先指出了模拟枚乘之作的人多文章多,但认为枚乘之后第一个有名有姓的作者就是傅毅,其作品《七激》被认为是与《七发》相近的一篇文章。《昭明文选》卷三十四李善注载有这一说法。但是自北大汉简《反淫》一出,这一成说不攻自破。

傅毅生年不详,卒年约为公元90年,属东汉辞赋家。史载其文学创作集中在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年间,"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⑤史载傅毅"早卒",则其文学创作必不会处于西汉时期。《七激》应该作于永平年号(57-75年)的后半段时期。枚乘卒于公元前140年,那么由枚乘创作《七发》至傅毅创作《七激》已200余年,这期间"七体"的发展如何,史载阙如。北大藏汉简《反淫》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使我们对"七体"发展的线索得以接续。

二、"七体"与六、七、八事

七体以主客对问结构成篇,说七事以为文章主体,这是七体的核心特征。但是每一篇七体赋,具体情况不尽相同,说几事,或共几个部分,依据什么而定?怎样判断模拟之作?

---

①王巍校注:《建安文学全书 曹植集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②熊良智:《楚辞文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49页。

③詹杭伦,张向荣:《楚辞解读》,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8页。

④(南朝·梁)刘勰著,董家平等注译:《文心雕龙注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⑤(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10-2613页。

（一）《反淫》并非《七发》的简写本

整理者指出所有简文内容中有四分之一的文句同于《七发》，这一比例虽不能断定其就是《七发》的简写本，但至少也可断定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从文章结构形态上也可判断两者并非同一作品。

西汉以来对大赋的模拟之作屡见不鲜，并不是一个特例。通常在文体结构形式上进行模拟，在具体的表述手法上也会有沿袭之作，如使用一些相同或相近的句式、词汇，甚至直接搬用成句也是一种可能。《反淫》与《七发》之间是模拟的关系，而非全本与简写本的关系。至于孰先孰后，尚待考察。

从现存代表作品来看，七体文章每一部分的划分多以被游说者的反应为标志，如《七发》中楚太子前五事答以“仆病未能”，第六件事答以“仆甚愿从，直恐为诸大夫累耳”，听到观涛一段后又称“仆病未能”。《七发》实由吴客说七事，依次分别是音乐之美、饮食之丰、车马之骏、游赏之乐、校猎之壮、宴席之喜及观涛之异，最后才“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如此则为七加一式，实为八事，七详一略。《文选》卷三十四收录了枚乘的《七发》八首，称“八首”即指七事加一结尾，因而郭建勋认为《七发》的总体框架是“七事一文而六过一是”①，说法不确。《反淫》虚设了两个形象进行对问，一为“魂”一为“魄子”，两者之间就世间感官享乐之事展开讨论，“魂”相当于客，“魄”相当于主。“魂”通过铺叙其事，主动陈说对“魄”进行启发，结构层次的划分以魄子称“浸病未能”为标志。据整理者认为：“魂说以六事（射御之乐、游观之乐、游仙之乐、宴饮之乐、宫室之乐、垂钓之乐等），魄子皆称‘浸病未能’，但在听了第七事之后终于病愈。”②如此则此文为六加一式，六详一略。与同时期的《七发》结构并不相同，可见非完全模拟之作。

（二）七事的具体结构方式不一

“七体”，都以主客问对的结构形式，设“七”事而劝说。而此七事，也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即多感官享受方面，谈论其他内容似乎就被排除在七体之外了。但继作者有时有一些细微的改造创新。如傅毅的《七激》以徒华公子与玄通子之间的对问展开，论说妙音、饮食、骏马、校猎、居处及圣道共六事，为五加一式，六事详略相当。张衡的《七辩》以无为先生与另七位人物之间的对话结构成篇，其中虚然子论宫室之丽，雕华子论滋味之丽，安存子论音乐之丽，阙丘子论女色之丽，空桐子论舆服之丽，依卫子论神仙之丽，此时已引起无为先生的兴趣，而最后的髣无子谈论汉皇政治最终赢得无为先生的叹服结束全文，此为六加一式，七事详略相当，但参与的人物数量达八人之多。曹植《七启》在玄微子与镜机子之间谈论了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仁义等六事，玄微子对前五事加以反对，对仁义之事表示兴趣，最终在听闻太和之民仕于陶唐之世后表示愿意听从，此为六加一式，七事详略相当，但前五事为否定，后二事为肯定。

可见同为问答体，又以七事为主的论述文章，在内部结构和逻辑形式上也是多样化的。《反淫》以问答体展开的结构以及六加一式的材料成篇，与《七发》又是类似的。竹书《反淫》的发现说明“七”这种文体在当时应该有不少作者，枚乘的作品流传于世从而影响更大，其他文章因为种种原因未得流传，从而被埋没。

（三）七体的文学表达

七体在文学表达上亦表现为典型的汉大赋特征。结构上以主客问答展开，有开头、主体与结尾的鲜明的谋篇布局意识。辞藻繁复华丽，穷形尽致，将对物欲的追求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欲擒故纵，最后一举推翻，昭示了精神感情的魅力。同时在具体的文学手法上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的句式，韵散兼行，读之富有节奏感，带有强烈的音乐色彩。形式上已经摈弃了“兮”字的痕迹，完全从

①郭建勋：《“七”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②傅刚，邵永海：《北大藏汉简〈反淫〉简说》，《文物》，2011 年第 6 期。

楚辞体中蜕变出来。七体在形式上改变了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文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在全部具备汉代大赋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又带有独立为文体的一些特征,即说七事以成文。此"七"为泛指的数字,具体到不同作品中又有六、七、八事的灵活运用。在问答体结构方式上,也有一些变通的运用。有一对一式,有一对七式,文中设置的人物,除枚乘《七发》为吴客与楚太子较为实指之外,其他作品,从人物命名上可见浓郁的虚拟色彩,这与汉大赋的论说方式有关。早在汉初,骚体赋中的人物或抒情对象即为虚拟形象,西汉中期的赋全盛期,人物虚拟更为普遍。

七体多列举七事或八事来分层论述,而七事或八事中,又以前面的五、六事为铺垫,突出最后一、二事,相对而言,前面的所有事物都出于物欲,最后一两件事往往属于精神范畴,总的趋势就是精神战胜物质。这是对人的自我觉醒的认识,也体现出西汉时期人们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

另外,七体特别强调言辞的重要性,反映了汉代文学观念的加强之势。《反淫》重点强调"天下大道",又如《七发》中的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即使扁鹊、巫咸亦不能治,指出:"今如太子之病者,独宜世之君子,博见强识,承闲语事,变度易意,常无离侧,以为羽翼。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这是认为君子的"要言妙道"可以启发太子,从根本上治其病。其后的曹植模拟之作《七启》则借镜机子之口直接说出了文辞的重要性:"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仆将为吾子说游观之至娱,演声色之妖靡。论变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丽。"所以七体本身对于文辞的偏重是其文体的一大特色。

三、《反淫》在早期辞赋史上的意义

枚乘卒于公元前140年,年近九十,他的创作活跃期应该在游吴时期。"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①《七发》大约创作于在文、景之际,汉代辞赋的面貌因而为之一变。《反淫》竹简抄写于西汉中期,其创作亦应处于文、景时期,在传世辞赋文献相对缺乏的情况下,也可以反映早期辞赋的情境。

《反淫》的开头设想了两个形象,并展开对话,结构上属于问答体,全文以语录组成,描述性文字所占比重较少。开篇叙述魄子患病,由魂前往劝说,铺叙七事以起其病,与其他辞赋所设以人物为主角不同,此文所设对话二者为两个有关人本身的概念,代表一个人的两面性进行心理斗争的过程,借以展示人内心的丰富复杂以及自我理性成长的自豪感。《反淫》述说七事以加强气势的说理方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说理散文与叙事散文,但用七事,在篇题中却不题"七",应当是七体最初兴起时文章命名不稳定性的表现。

枚乘的《七发》与竹书《反淫》代表了一种新体赋之体式的确立,是汉大赋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后世作者竞相效仿,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后来的《昭明文选》曾将《七发》《七启》《七命》等单列为一种文体并称之为"七"。七体首先在内容上改变了大赋一味对君主赞颂的旨意,尽管仍有劝百而讽一之嫌,但层层递进的结构方式,欲擒故纵的表达技巧使得文章气势波澜起伏,最后寓意得以突出,增强了文章的社会价值。这两篇赋结构相似,都是篇首有序简介主人公,引起话题。主体部分由七段或六段文字构成,最后一部分又是全文的结束部分。主体每一部分主要先写客之夸饰,次写主之反应,以主之反应映衬客之说辞。可见早期的"七体",都以主客问对的结构形式,设"七"事而劝说。而此七事,也有具体的内容限制,即多感官享受方面,谈论其他内容似乎就被排除在七体之外了。

《七发》与《反淫》创作的时代大致相近,所描写的时代背景较有代表性。尽管二者都可能只是

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24页。

逞才辩辞之作，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西汉初中期贵族王侯生活上的侈靡追求，以及精神颓萎的面貌，并痛下针砭，或以包融百家文化的要言妙道去解惑，或以天下大道去化解人生的忧患，现实的针对性很强，思想观念上积极有为。《反淫》与《七发》二赋所列举的种种人间享乐描绘了人体的各种物质感官欲望之极致体验，从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各个角度进行生发，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心觉的要求最高，也最难以满足。二赋说明了一个道理，世间所有的物质感官享受都只是暂时的，不能令人解脱对人生的终极思考。只有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特有的思维活动，求得改变人生轨迹，实现人与社会的互动，才是对人生在世最有价值的回报。这两篇赋以“要言妙道”或“天下大道”为最高追求，是心觉的崇高体验，散发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

竹书《反淫》还证实了汉武帝崇文政策促使文辞之变的说法。《史记·儒林列传》多处记载了汉武帝时期对文学之士的奖掖提拔。如：“今上（武帝）即位。……于是诏方正贤良志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为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书·董仲舒传》也曾提到：“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文学气派为之一振，上有所好，则下有所进，文辞表述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专门以文辞华丽来提振士气的作品得以产生。《七发》通篇都在谈论“要言妙道”，相应地使用了繁复的辞藻，反复使用各种比喻和叠字，叙事状物务必以穷形尽致为旨。《反淫》同样文采斐然，有些竹简的文句与《七发》十分接近，基本相同的部分有四分之一左右。结词造句，较多使用对偶，两两相对，句式整齐，用于铺叙，更显文章气势。整篇文章同样是以言辞以劝说对方，并最终得到了对方的称服。

从想像的夸张奇特上来看，《反淫》仿佛更胜一筹。如屈原虽好为浪漫之作，他的大量作品，所虚构的人物有鬼、神、仙、巫，但仍属以人为本的想象物，是人间生活的反映，仍是现实主义的范畴。《七发》的主人公虽为虚构的人物，但显然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主体人格。而《反淫》中的两个形象，一为“魂”，一为“魄子”，皆为精神性的事物，无形无影，却问答有语，十分奇特。因而《反淫》带有了较多的浪漫主义色彩。魂为人之阳神，魄为人之阴神，魂与魄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两面，两者的争辩代表了人的肉体欲求与心灵诉求的斗争，激化了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的矛盾，使得本文更具有强烈的思辨性质。从不同层面来讲，《反淫》都为“七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责任编辑：金　城　jdxbjc@163.com]